

美國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之 制訂歷程——法律改革的政治 經濟社會考察

鄭麗珍

壹、前言

在1993年10月，臺灣發生受暴婦女鄧如雯殺夫的事件，經過媒體的披露，引發社會大眾的矚目。基於家庭暴力事件的持續性、長期性和隱密性之特徵，鄧如雯當時如果依據傳統的刑法來追訴，將面臨舉證不易、曠日廢時等障礙；在她七年的受虐期間裡孤立無援、倍感煎熬，她最後必須殺夫才能終止丈夫對她無盡的虐待，因為她的悲劇終於喚起臺灣社會的矚目，在婦女團體、立法院的共同努力下，在1998年終於催生《家庭暴力防治法》（吳素霞、張錦麗，2011），使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制訂《家庭暴力防治法》專法的國家。1998年6月24日，臺灣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公布施行，這部專法是以美國的《婚姻與家庭暴力模範法規》（*Model Code on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National Council of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 2012）作為藍圖，進行法條的轉譯和法律的修訂，並施行於臺灣社會，這是一個法律移植的案例。但一個法律形成必定有該國發展的政治經濟脈絡，實施某個法律在回應當代社會的問題，並在天時地利的政治經濟條件下進行的法律改革（高鳳仙，1998）。本論文就是在追溯美國家庭暴力防治法律的形成歷史，及該法實施後對於家庭暴力防治制度的影響，藉以凸顯《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發展之獨特性和複雜性，可作為臺灣移植該專法的比較與反思。

其實，繼受或借用外國法律或制度的法律移植路徑，對於改善本國法的法律制度是一種快速而有效的實用作法，引進國外法往往帶給移入的法律體系很多的改革刺激（irritants），而引發法律移入國制訂法律上的改變（Teubner, 1998）。在法律的溯源方面，本文將勾勒出美國社會訂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的政治經濟社會

之歷史軌跡。亦即，美國社會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脈絡發展出這套防治暴力的法律規章？這套法律的制定在回應家庭暴力的防治方面有些什麼特色？在因應家庭暴力事件的頻傳，美國的法律制度進行了什麼樣的改革？最重要的是，這套法律的制訂最後發揮了什麼樣的防治效果？因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探討美國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典章制度的形成，特別是勾勒出當時形成法律的政治經濟社會之歷史事件與軌跡。接著，探討美國法的法律實踐成效，特別是在降低家庭暴力事件發生的比例方面是否有明顯的改善。

貳、美國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專法的發展歷程與實踐成效

在17世紀，相較於其他歐陸國家，美國是一個新興的移民地區，當時英國的清教徒因為不滿英國的宗教環境而選擇移民到「新世界」（後來稱之為美國）的地方。為了維護新世界的社會秩序，美國社會在不同時期面對家庭暴力事件發生的社會回應為何？這些回應又如何影響到後來的親密關係的防治法律制度的發展？本章節的內容將運用文獻資料的分析來勾勒出美國社會對於家庭暴力防治事件的社會回應，主要的方式是藉由各個時期的主要法律論述，以及這些論述促成的各個時期所發展出來的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最

後探討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對如何促成防治家庭暴力事件的專法形成。

依據文獻的分析，筆者將美國歷史上對於親密關係暴力的司法回應，依據法院對於毆妻事件的判決和定義大致可以分成四個階段，一是毆妻事件會破壞家庭和諧說時期、二是丈夫有毆妻特權說時期、三是毆妻事件屬家庭隱私範疇說時期、四是毆妻事件是家庭不適應說時期、五是家庭暴力防治專法形成時期。分別說明如下。

一、毆妻事件破壞家庭和諧說時期 （1630～1760年間）

根據歷史學家Pleck（1987）的說法，清教徒剛從英國移民到新世界時，為了建立堅強的共有共享社區來抵抗移民時期的惡劣環境和困苦生活，支持一個合諧而穩定家庭是當時教會、社區、國家的共識，殘酷和暴力對待自己妻子被視為一種「邪惡的馬車」（wicked carriage），有危害社會秩序的風險。在當時，為了防範家庭暴力事件，鄰里社區被期待要去非正式地監控各個家庭，若發生家庭爭吵事件時，鄰里居民的責任就會出面勸告糾正來化解家庭的衝突；此時，家庭隱私並不重要，而是維持家庭和諧穩定的價值（Pleck, 1987）。除了鄰里的監控外，教會的牧師也是家庭和諧的重要守護者，不僅在教會的講道循循善誘信徒不要暴力對待自己的妻子，甚至親自拜訪發生家庭暴

力事件的家庭，予以勸勉和禱告；如果需要，牧師甚至會將殘酷暴力對待妻子、親人、僕人等的加害人送交教會法庭審判，目的不在於決定有罪與否，而是在於逼出加害人的懺悔和認錯（Pleck, 1987）。由上所述，初來乍到美國的新移民社會對於暴力對待妻子或家人的丈夫並不符合當時的社會規範。

根據Pleck（1987）的文件分析，當時所謂的新英格蘭殖民地（來自英國的移民），有兩個殖民區，Massachusetts和Plymouth，是美國歷史上最早針對各種家庭暴力事件訂有刑事制度的行政單位，也可能是西方世界中最早開啟家庭暴力事件「刑事化」處理的先河。例如，1641年，殖民區通過*Massachusetts Body of Liberties*，就提及有關已婚婦女的暴力事件，其中有法條指出：「已婚婦女應該免於被她的丈夫體罰或鞭打，除非是基於對方攻擊的防衛」。幾年後，該法條再增加禁止丈夫毆妻的條款；在1672年，Plymouth殖民區也通過反毆妻的法律，並訂定罰則，毆打妻子的丈夫必須支付罰鍰五英鎊或處以鞭刑（Pleck, 1987）。雖然，兩個殖民地地區的*Body of Liberties*認定毆妻的行為是違法的，但遇到被毆打妻子提出離婚時，法律上卻不允許，維繫家庭的完整仍是該時期的重要社會規範。例如，文件顯示，法院曾經命因家庭暴力而離家的妻子返回丈夫住處，不允許夫妻分

居；法院也曾經同意Plymouth的一位被毆打的婦女暫時與丈夫分居，直到丈夫悔改後，仍命返家同居（Pleck, 1987）。

接著，美國社會面臨重大的變遷，來自歐陸其他國家的新移民一波波地湧至美國，很多新移民的信仰與清教徒不同，有些人甚至沒有宗教信仰，已經改變原來殖民地地區的生活型態與社區共識的樣貌，這可從上述Massachusetts和Plymouth殖民區的法院有關婚姻暴力的判決逐漸減少看出（Pleck, 1987）。在1680年代，母國（英國）政府在此時也開始積極介入新世界的社會運作，不再將殖民地視為國際事務，並派任殖民官員到當地進行司法制度的改革，目的是希望新殖民地地區的法律運作應該與英國的普通法同一化，以彰顯殖民的主權（Pleck, 1987）。到了1760年代，新英格蘭殖民地地區的家庭、社區與國家的宗教法庭的管制已經降低，社區與教會對於社區內發生毆妻事件已不再熱衷監控或介入，甚至避而不管，教會法庭也不再運作，而毆妻的罰鍰或鞭刑也遭到批評，諸多證據顯示毆妻事件刑事化處理的時代至此已經逐漸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移植自母國普通法的相關法律。

二、丈夫有毆妻特權說時期（1760-1890年間）

在1760年代的後半期，英國法官William Blackstone發表〈英國法

評述》(Commentari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主張：「犯罪行為通常是發生在社會中的不當行為，但發生在私領域的不當行為是不受法律規制的」(Pleck, 1987)。另一個歷史學者Siegel (1996)也提出，在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Blackstone法官提出「夫妻一體說」(marital unity)，主張妻子的法律地位與丈夫的法律地位融合為一，妻子任何提訴，丈夫必須參與，丈夫必須為妻子的法律行為負起責任」。根據Blackstone法官的邏輯，丈夫在結婚後就取得妻子個人的各項權益，例如，她的勞動價值、她的婚後財產，一旦結婚後，丈夫是一個家的「頭」，妻子應該服從及服侍丈夫，丈夫也應善盡互惠責任照顧妻子、代行她的法律權利，妻子必須接受丈夫的管控，如不接受，丈夫就可以對妻子施予體罰或懲戒，賦予丈夫有毆妻的特權(the right of chastisement)(Siegel, 1996)。不過，Blackstone法官進一步表示，即便丈夫有毆妻的特權，除非有合理的理由才能行使「規範和懲戒」的手段，且必須是「適度的矯正」(moderate correction)，如所謂「拇指條款」(rule of thumb)的規定(註1)，就是指出丈夫毆打妻子的棍子不可以超過他的拇指大小(Siegel, 1996, p. 2123)。

由於Blackstone的觀點對當時美國的司法文化影響很大，許多法官(也許不是

全部)開始引述丈夫的毆妻特權說作為判決理由。例如，南北戰爭時期的美國南方和中大西洋區(mid-Atlantic regions)的州法院皆肯認丈夫的毆妻特權說(Siegel, 1996)。當時，第一個引用丈夫有懲戒特權說作為抗辯理由的案件是1824年的Bradley v. State案件，這是發生在美國密西西比州一個丈夫毆打妻子的案件，法院認定家庭內的爭吵不宜公開審判造成雙方的名譽受損，因而認定丈夫對於妻子的不當行為行使適度的懲戒是合理的。之後，有更多的類似的判決出現，大致都是主張丈夫行使「懲戒權」經常是有其必要的，為的是糾正妻子的違法或偏差行為，即便毆妻致傷，也不應該視為傷害罪或違法行為，而予以處罰(Siegel, 1996)。

大約在1840~1850年代，有一些民間社會團體開始抗議丈夫的毆妻特權，例如，戒酒運動(Pleck, 1987, p. 55)(註2)及女權運動的倡議團體。如在1848年，美國各地的女權運動者於紐約州的Seneca Falls市聚會，發佈感傷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將致力於爭取婦女的權利，稱之為第一波女權運動(Schneider, 2000)。Seneca Falls市的一位禁酒運動倡議者Amelia Bloomer出版第一本禁酒運動期刊，名為Lily，在這個期刊中，許多女性主義倡議者開始發表受暴婦女的苦難故事，倡議請求離婚是解決苦難的方法，這是首次女權運動者透過公開報導來影響

社會有關家庭暴力事件的觀點。不同於禁酒運動者，女權運動者對於家庭暴力的致因及社會對策（social remedies）之主張不同，例如，他們突破了禁酒運動者有關毆妻是酒精作祟的說法，直指毆妻基本上是婚姻本身的法律結構問題，挑戰普通法中的婚姻地位法則；他們主張普通法有關婚姻關係的範定給予丈夫對妻子的實質上及象徵上之權威，導致婚姻關係的不平權，倡議直接針對婚姻的法律關係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例如，給予妻子有獨立自主的權利向酗酒或毆妻的丈夫提起離婚訴訟（Pleck, 1987, pp. 58-60）（註3）。這些倡議的確影響了美國法院開始修改英國普通法對於婚姻和婦女地位的一些規定，給予婦女更多財產權和侵權損害請求權（Pleck, 1987）。

但是，美國法律必須到1871年的兩個案件判決，丈夫毆妻特權說才正式被廢除。第一個判決是阿拉巴馬州法院審理 *Fulgham v. State* 案件，被告 *Fulgham* 先生是一位自由的黑奴，因為管教孩子過度，妻子介入，卻遭到丈夫的毆打，州檢察官以傷害罪起訴 *Fulgham* 先生，主張妻子不是丈夫的奴隸，已婚的夫妻地位應該是平等的，駁回 *Fulgham* 先生提出的丈夫懲戒特權（Siegel, 1996）。第二個判決是麻塞諸塞州法院所審理的 *Commonwealth v. McAfee* 案件，被告 *McAfee* 先生多次毆打其酗酒的妻子，打得她的臉部和頭部受

傷，更導致他的妻子摔倒、撞到頭而致死，*McAfee* 先生的律師以丈夫對妻子有懲戒特權作為抗辯，但麻塞諸塞州最高法院並未接受，主張兇殘的毆打妻子不應該是已婚丈夫的任何特權（Siegel, 1996）。

在上述兩個判決之後，毆妻事件在美國各法院開始被認定為「違法行為」。既然毆妻是違法的行為，法院是否要對毆妻的加害人施予懲罰呢？應該採用何種方式來懲罰？這樣的討論就開啟了毆妻行為的「刑事化處罰」的法律論述。在1870年代，社會倡議團體主張各州政府應該通過法律訂定處罰方式，當時確實有幾個州議會（如：加州、北卡羅來納州、內華達州、密蘇里州等）都有提案針對毆妻初犯、慣犯、嚴重犯等施予短期監禁或施予鞭刑來遏阻暴力行為，但都沒有立法通過，最後在1882年馬利蘭州議會終於通過施予毆妻丈夫鞭刑的法律，毆妻的丈夫如果被判有罪將接受40鞭刑，再度引進之前移民初期的毆妻處罰方式，例如，達拉威州是在1901年通過及奧瑞岡州是在1906年通過施予毆妻丈夫鞭刑的法律（Siegel, 1996）。在1884～1885年間通過類似的法律，有麻塞諸塞州、賓夕法尼亞州、新罕布什爾州等州政府（Pleck, 1987）。在當時，要起訴並監禁毆妻的丈夫需要考量妻子的意願，起訴不易，而提議鞭刑處罰的倡議者主張，相對於監禁或罰鍰，鞭刑所帶來的疼痛感更能讓毆妻者感同身受被

毆打者的疼痛感，又可降低政府的監禁成本；最重要的是，鞭刑後，處罰就結束，不致因監禁而拆散完整的家庭，這樣的訴求頗受當時代的司法人員所支持，例如，當時具有影響力的美國律師公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成員也認同鞭刑的處罰（Pleck, 1987）。

從上述的發展來看，此時期的美國州政府已經開始將毆妻事件視為犯罪行為，並通過某種刑事處罰來矯正及控制毆妻的偏差行為。不過，根據一些文件顯示，當時許多州政府雖然通過鞭刑的法律，但真正的實施其實並不普遍，且處罰的對象多為低社經地位或非裔男性，高社經的白人很少會接受這類的處罰（Siegel, 1996）。隨著時代的演進，此種體罰是的刑事處罰逐漸在羞辱人性的批評聲浪下，政府於1948年將最後一個位於馬利蘭州的鞭刑站拆除，而位於達拉威州的鞭刑站最終在1952年正式落幕（Pleck, 1987）。

三、毆妻事件是家庭隱私說時期 （1890～1920年間）

根據Seigel（1996）的說法，美國各州的法院在1890年代後幾乎都不再肯認丈夫有毆妻的特權，但女權運動者對於家庭內仍然存在的夫妻不平等結構繼續倡議改革；當時的家事法專家James Schouler，於1870年提出所謂的「伴侶婚姻」概念（companionate marriage）之論述，主張

國家應該尊重家庭內的事務應由家庭內的家長來治理，法律不宜過度的介入家庭事務；他說：

在較不進步的社會裡，丈夫經常以武力治理家庭，……（近年來）妻子比較被視為是丈夫的伴侶，丈夫的毆妻特權在今天社會是比較有問題的，愛的規則已經超越武力規則了。

亦即，夫妻的關係其實是「伴侶關係」，是基於情感的結合，並非權威高低的組合。接著，有更多的論述加入伴侶式婚姻關係的具體化，例如，當時另一位學者William Alcott也嘗試描述婚姻關係中的妻子天職，主張妻子的服從具有利他性，服務家人是其自我實現的路徑；當時一位很有名牧師的妻子Eunice Beecher主張，家由男人來治理，是因為家是男人建立起來的，丈夫是家的「頭」，女人的天性喜歡溫柔，適合照顧人，並從照顧家人獲得喜悅，妻子之所以願意以丈夫為「頭」，不是出於害怕權威，而是出於愛（Siegel, 1996）。因此，婚姻關係就被定義為，丈夫的權威決定了婚姻關係的所在，妻子的利他性成就完整的家，而隨著過去引發違法爭議的毆妻特權逐漸廢除，上述這些有關婚姻關係的新解正好「替代」了有關親密關係暴力衝突是否應該予以約束的新論點（Siegel, 1996）。

首先，當親密關係暴力事件需要進行

刑事程序時，立基於上述的婚姻關係之論述，法院是如何來進行判決的？相對於上一時期提到的1871年之Fulgham v. State的判決，在1968年North Carolina州的State v. Rhodes案件中，審理的事實開始於Rhodes先生鞭打他的妻子三下，每個傷痕不超過他的拇指大小，一審法院以丈夫對妻子有懲戒特權而判決Rhodes先生無罪，上訴到高等法院時，法院認定Rhodes先生的鞭打確實構成傷害罪，但理由不是有無懲戒特權之故，而是因為受害人的身分是妻子，類似這種輕微的傷害行為應該留給家庭的主導者（即丈夫）進行「家庭內治理」（family government），上法院提起告訴是「公開之惡」（evil of publicity）（Siegel, 1996）。法院進一步解釋，之所以作此決定，不是因為丈夫有毆妻的特權，而是法院不應該為這樣的小事去干涉家庭內的治理，法院應該在破壞家庭隱私的壞處和處罰輕微家庭暴力的好處之間做出平衡的決定（Siegel, 1996）。由此可知，即便毆妻特權已遭廢除，但護衛家庭隱私的司法邏輯已逐漸取代毆妻特權說，成為法院無意願介入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的證明。

既然將家庭暴力事件刑事化，女權運動者就主張丈夫暴力對待妻子，從受害人的觀點來說，應該被視為一種侵權行為，受害的妻子應該可以向丈夫請求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屬於民事告訴的程序，不

是由國家來介入刑事程序的程序。不過，在當時，會向法院提出侵權賠償的請求的案件，常見之於一些有財產可分配的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內，他們的受暴妻子通常不會提起刑事訴訟，反而是以民事訴訟程序來請求法院給予補償（Siegel, 1996）。例如，紐約在1860年代曾經通過一個法律條文，允許已婚婦女有權管理自己的薪水，以及有權利對於任何人施加於她身上的侵權行為提出損害賠償，但此時一位已婚女性向法院提出侵權求償，告訴的對象是毆打她的丈夫，紐約最高法院卻顯得裹足不前，雖然依法判決丈夫應支付妻子一百美元作為其造成妻子身體傷害的賠償費，但仍提醒該條文並不適用於夫妻之間的損害賠償，因為求償可能造成婚姻中的各種利益衝突，有害於妻子在婚姻中的利他性伴侶之利益，對於丈夫的財產權也會有所損害（Siegel, 1996）。在Abbott v. Abbott案的判決中，Maine州最高法院也追隨紐約州的這個判決結果，提出所謂的「配偶間侵權賠償免責」（inter-spousal tort immunity）法則，之後被廣為使用，影響深遠（Siegel, 1996, p. 2165）（註4）。在1910年左右，在解釋已婚婦女的財產權時，美國最高法院表示「配偶間侵權賠償免責」原則是為了保護家庭隱私和家庭和諧，國會通過婦女財產權法案，並不是為了讓夫妻互相告訴的權利，也不是去干擾家庭的關係（Siegel, 1996）。此時的法院

不再需要論述丈夫的毆妻行為是否「違法」，而是直接給丈夫「免責權」，法院的判決目的是在維繫和諧家庭，強調婚姻關係中的愛與情感，而非強調衝突。

四、毆妻事件是家庭不適應說時期 (1920-1970年間)

在1920～1970年代之間，基於家庭暴力事件的隱密特性，社會上很少公共討論有關這個問題的發生與影響。依據文件資料顯示，當時的警察人員會稱「毆妻事件」是「家庭內的滋擾事件」(domestic disturbance)，婚姻諮商師或社會工作師稱之為「家庭不適應」(family maladjustment)問題，精神科醫生則主張受暴婦女應該是有被虐傾向(masochism)，毆妻的發生是妻子有意刺激丈夫打她；而家庭社會學主要的期刊*Th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在1939～1969年之間沒有任何有關家庭暴力為主題的論文發表，而媒體報導相關事件也要到1974年才有進展(Siegel, 1996)。

在1910年，美國第一個專門處理家庭關係的家事法院設立於紐約州的Buffalo市，只要和家庭關係有關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開始由這個專門法庭來審理，例如，離婚、家庭暴力、兒童贍養費、少年事件等，其他城市隨後也設立家事法庭(Pleck, 1987)。在1920年以後，美國法

院已經不再認定丈夫有毆妻的特權。在一項1920年的社會學調查中，顯示夫妻向法院提出離婚協商的案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請求理由都與毆妻有關，而大多數的毆妻型態為身體虐待，請求家事法院解消婚姻(Pleck, 1987)。當時家事法院的法官主張，家庭暴力事件不同於非家庭關係的犯罪事件，的確應該採用不同的對應取向，例如，有法官表示：

從法律的觀點來說，家庭暴力的問題不是犯罪行為，來到法院請求排解糾紛的男女也不是頑劣的違法者。(Pleck, 1987)

或有法官指出，婚姻暴力的發生主要是：「丈夫這一造的懶惰、固執、冷漠、無能、疏忽、生理缺陷、心理問題等」(Pleck, 1987)。由此可知，家事法官們認定親密關係暴力主要是認定其為丈夫本身的人格特質或心理疾病所致；此外也認為而妻子的衝動言語導致暴力的發生，只要透過婚姻的調解(reconciliation)、關係的修補(mending)，應該可以彌平雙方的衝突(Pleck, 1987)。因此，法院在處理婚姻暴力事件時，大致朝向「去刑事化」的取向，採用「治療性架構」(therapeutic framework)，法官不鼓勵受暴的妻子提起刑事告訴，而是和社工人員一起合作，鼓勵受暴的妻子與丈夫進行調解，提供正式或非正式的諮商服務，最終目的在維繫與重建夫妻的關係，降低他們

分居或離婚的可能性（Siegel, 1996）。

在當時的美國，法院之所以採取這樣的司法回應取向，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受到當時盛行的Frued精神醫學派思潮的影響，該學說認為受暴的婦女有被虐的傾向，主要是源自幼年時期的性壓抑及發展上的未竟事宜，婦女因此發展出自戀性、被動性、被虐性等不同因應方式，而Freud所提議的心理分析治療正好可以協助婦女從接納到擺脫過去的糾纏；再加上19世紀初社工專業的出現，女性的個案工作員運用家庭訪視的工作方法，得以接近受暴婦女的生活和探求婦女的想法，運用心理分析的架構進行評估，可以提供專業的資料給法官作為判決的依據（Pleck, 1987）。在運作上，一旦妻子提出離婚的請求，法院的社會服務部門就會安排個案工作員與夫妻會談，一方面安排精神科的檢查以排除心理問題的疑慮，另一方面安排家庭訪視和個案會談，蒐集家人的身心狀況、經濟能力、適應問題、兒童照顧等方面的資料，最後提出一份調查報告給法院作為判決的依據；由此看出，當時的家事法院似乎在扮演著「再社會化」家庭的一個社會機構（Pleck, 1987）。

在這段時期裡，家庭暴力案件比起以前更容易接近使用法院，但大多數刑事程序的案件大多會被撤銷，受暴妻子只好向民事法院請求賠償；而為了避免濫訴，家事法庭開始收費，並要求聘請律師，讓

離婚請求不那麼隨意而方便；對於無資力者，法院會提供法律服務的轉介（Pleck, 1987）。在法院的判決方面，家事法庭大量聘用個案工作員，對於家庭關係的細節進行調查和理解，法官再依據個案工作員的調查資料來進行判決。有趣的是，法官的判決特色經常是介入家庭關係的調整，不只是中立的判決。例如，依據Pleck（1987）的描述，1920年的紐約法院，法官轉介一個家庭暴力家庭給當地的一個民間組織，協助受暴婦女進行牙齒治療、裝扮指導等，夫妻關係改善後，法院就宣布「撤案」；另外，法院不輕易判決離婚，但如果有毆妻其況，會允許夫妻暫時分居（分開），要求丈夫支付一週的生活費用，由法院轉交受害的婦女，並要求觀護員監督執行；若丈夫違反裁判，法院可予以罰鍰或監禁，此時已經略具有刑事化特色了。

五、防治家庭暴力事件的事法形成時期（1960～迄今）

在1960年代第二波女權運動中，女性主義倡議者將家庭暴力定義為「親密關係暴力」（intimate violence relationship），不再限制在有婚姻關係的配偶關係，而有關防治家庭暴力的司法改革工作主要是由法律人員來主導，透過法律這個工具來爭取受暴婦女的安全和保護，並爭取家庭暴力防治的立法來確立制度性的

保障。他們透過成立組織與建立聯盟的方式（Schneider, 2000, p. 38）（註5），不少參與倡議的婦女本身就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人，以自身的經驗來倡議這個主題，充分顯示保護受暴婦女運動的草根性（Pleck, 1987），展開「由下而上」的女性主義法律改革。女性主義倡議者提出三個倡議的主軸，一是為受暴婦女設置庇護所，二是要求警察逮捕施暴者，三是訂定《家庭暴力防治法》（Tieney, 1982）。

（一）庇護所運動（shelter movement） 與受暴婦女議題的再發現

在美國，早在禁酒運動時就有一些安全屋的設置，如保護兒童及婦女協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Women），對外宣傳有關家庭暴力事件的資訊，開始提供受暴婦女及兒童受害人暫時性居住地方，但當時的設置並不廣泛（Pleck, 1987）。在1971年，一個英國的基金會Chiswick Women's Aid這個組織在倫敦市設置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提供給受暴婦女的庇護所，創辦人是Erin Pizzey女士，她與幾位婦女設立一個社區中心，提供兒童托育服務及無家婦女的暫居之處，沒想到吸引來自各地的婦女前來暫住，她們大多都是遭受暴力，也無法取得社會服務的協助，在訪談進住庇護所的受暴婦女經驗後，Pizzey女士出版了一本名為*Scream Quietly or the Neighbors Will*

*Hear*的書，也拍成影片，並到處巡迴演講，終於引起媒體及大眾的注意（Pleck, 1987）。

英國的受暴婦女庇護所運動也隨著媒體的報導傳播至美國地區，例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在1976年至少有七篇文章在討論庇護所似乎是解決婚姻暴力的一個方法（Tieney, 1982）。而美國的婦女組織也受到激勵，開始移植英國庇護所經營經驗，在美國各地設立受暴婦女庇護所，提供住所和危機服務。這些庇護所大多是由女性經營、女性主導，目的在提供受暴婦女離開受暴環境後可以去的安全地方，例如，明尼蘇達州的St. Paul市的Women's Advocates, Inc.是一所女性主義觀點的草根庇護所，成立於1974年（Tieney, 1982, p. 207）（註6），另一所相似的單位是舊金山市的La Casa de las Madres（Pleck, 1987）。在運作上，以St. Paul的庇護所為例，他們一開始只是提供「熱線服務」，只要接到有受暴婦女處於不安全情境而需要暫時性居所協助的電話，她們就安排這些婦女進駐工作人員家裡，接著從單身公寓擴大到五間臥室的三層樓房子，顯示需求極高；他們的庇護所一般不會聘任專業人員，而是由少數支薪人員及志工來管理，所內的行政事務是由婦女住民集體分工執行，工作人員稱這些住民為「姊妹」，而不是有症狀的「案主」，是家暴犯罪的受害人，工作人員會

跟這些婦女說明有關傷害罪的刑事程序，如果婦女準備好，工作人員就會帶她們去找律師、醫生或社會局開啟自助的歷程（Pleck, 1987）。

根據統計，在1975～1978年間，美國各州都有女權團體或民間團體積極投入設置庇護所來收容逃離毆妻丈夫的受暴婦女及其子女，當時庇護所就有170所，提供給受暴婦女的各種補助也顯著的增加，他們的經營理念不盡相同，贊助經費也相當多元，有教會、民間組織、聯合勸募、市政府、州政府和聯邦組織等，如來自聯邦勞動部的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Training Act（CFET）下的The Law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LEAA），這個時期是庇護所百花齊放的時期（Tieney, 1982）。

根據Gordon（2002）的說法，女性主義倡議者之所以參與設置庇護所，一方面是在提供逃離毆妻丈夫的妻子一個安全的居所，另一方面提供這些婦女有關離婚和子女監護權的法律協助；經由這些真實個案的經驗，就可以透過媒體報導不公正的個案故事，運用這個故事來倡議家庭法律的改變。根據統計，1977年，《紐約時報》發表44篇有關家庭暴力事件的報導，案件從家庭暴力防治熱線、設立庇護所、報導殺死施暴丈夫案件的審理皆有，相對於1976年只有7件的報導，親密暴力事件的能見度明顯增加（Tieney, 1982）。簡

言之，保護受暴婦女的庇護所運動的確帶動了社會大眾對於親密暴力事件的注意力，也連帶改變社會大眾對於婚姻暴力事件的看法，有助於後續的修法支持。

（二）要求警察逮捕施暴者

根據Schneider（2000）的說法，第二波保護受暴婦女運動的倡議者認為法律的改革是確保這些婦女人身安全的重要工具，而其中最先被批評的就是警察制度，特別是警察在婦女遭受暴力的時候長期不積極逮捕施行傷害的施暴者，改革警察的逮捕政策成為第二波運動的首要目標。

首先，在1970年代，一群女性主義倡議律師提出集體訴訟，控告兩個城市的市警察局及其局長，紐約市和加州的Oakland市，企圖藉由訴訟來改變警察的迴避逮捕政策。在1974年，Marjory Fields律師（本身也是受暴婦女）為了一位當事人因為警察無法回應其毆妻事件的求救，約談紐約市警局，卻被未獲回應，就將此事告知紐約時報，引起大眾注意到警察的迴避逮捕問題；在1976年，在Scott v. Hart案件中，一位女性律師代表四位受暴婦女控告加州Oakland市立警局，主張該局警察對於家暴事件的迴避逮捕，造成傷害，經協商後，警局承諾改善，保證將來會以一般傷害案件來更快速的回應家庭暴力事件，這是第一宗人民控告警察機關的案件；在1977年，在Bruno v. Codd案

件中，紐約市的Laurie Woods律師，代表Bruno太太（受暴婦女）控告紐約市警局及警察署長Michael Codd，主張紐約市的警察對於家庭暴力事件的處理不同於陌生人的傷害事件，對於家暴事件經常不採取任何對應行動，即使有可信的證據也不逕行逮捕，終於獲得紐約市警局承諾只要確信有傷害事件或違反保護令事件，他們一定會予以逮捕，並留在現場確保婦女安全（Schneider, 2000）。

（三）訂定家庭暴力防治專法

Schneider（2000）主張，「制訂法律」（lawmaking）是受暴婦女運動的核心訴求，將親密關係的暴力轉化為婦女的平等權和完整的公民權，將法律的倡議和法律的改革關注於性別與暴力發生關連的問題上。Tierney（1982）認為，美國家庭暴力防治立法的促成，主要是來自當時司法制度在回應殘忍暴行和明目張膽的家庭暴力事件顯得相當無力和無效，經由女性主義者所發起的保護受暴婦女運動之呼籲，美國法院在處罰施暴行為的刑事力道增加，在婦女申請保護令的程序上也更加強；雖然，法院和檢察官的態度仍然不想過於強力介入家庭暴力事件，但各州所通過的相關法律仍然會提醒他們在裁判相關案件時必須關注受暴婦女的法律權益。

在州政府的層級，從1976年開始，州議會開始通過有關家庭暴力防治的立

法，提供經費設立庇護所、改革通報程序、廢除配偶間侵權免責原則、改革刑事訴訟程序等；在聯邦層級的改革方面，國會在1968年設立LEAA辦公室，專責審查與補助州政府及民間單位提供強暴危機方案及受暴婦女庇護所方案；但在聯邦修法方面，從1977年開始，曾是社工出身的Barbara Mikulski國會議員就提議修法，但基於其他男性國會議員擔心過於順從女性主義倡議者的意見，一直無法通過，卡特總統於是在1979年設立the Office of Domestic Violence，編列九百萬美金進行有關親密關係暴力的教育訓練及資訊傳播，先取得大家的共識；最後，直到1984年，美國國會終於通過《家庭暴力防治與服務法》（*The 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and Services Act*，簡稱FVPSA），要求聯邦政府編列1.25億美元預算來資助日益增加的庇護所經費，以及提供受暴婦女的意識覺醒及家庭暴力防治服務的經費，但當時雷根總統只願意編列600萬美金執行該計畫（Pleck, 1987）。

在1994年1月13～15日之間，全國少年與家庭法官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在加州San Diego市召開諮詢會議，討論有關家庭暴力議題的防治法規及指引之訂定，以便提供國會修法之參考，當時邀請的對象包含多元的專業人士，例如，法官、檢察官、刑事律師、家事律師、受暴婦女倡議

者、醫療衛生專業人士、司法行政人員、學者等，最後草擬一份報告，定名為《婚姻與家庭暴力模範法規》，50頁的內容包括五個章節，分別為總則、刑事程序與罰則、民事保護令、家庭與兒童、預防與處遇。據美國律師公會的建議，這個模範法規不宜各州都一體適用，還是要依據各州的情況因地制宜的參考；在參考使用這份模範法規時，有幾個原則的建議如下：

（1）視婚姻和家庭暴力為犯罪行為，應該積極及徹底的介入解決。

（2）重視受害人及兒童的安全，以及要求加害人負起責任。

（3）提供一套受害人可以取得完整保護令的程序。

（4）州政府與社區單位應協調發展出可以確認、介入及預防婚姻及家庭暴力的發生。（The Advocates for Human Rights, 2020）

接著，在1994年，美國發生Nicole Brown Simpson和Ron Goldman被謀殺事件，嫌疑犯為足球明星O. J. Simpson，他是一位黑人，這是一件因為親密關係暴力事件所引發的謀殺案，受害人的白人身份，終於引發美國國會的重視，同情「脆弱白人」的共和黨主導的國會不得不正視家庭暴力事件的嚴重性，快速在1994年通過*The 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其中第四章定名為婦女受暴法案（*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簡稱VAWA），編列三年1,500萬元來防治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其中300萬元用於建立24小時的全國熱線（1-800-help），另外2,600萬元分配給州政府，用於各州的警政與檢察體系的改革（Bailey, 2010）。當時，婦女受暴法之所以可以順利通過，主要是受到Nicole Brown Simpson受暴事件所引發的社會效應所致，嫌疑犯是一位黑人運動名人，而一個脆弱的白人女性遭受傷害，尤其法院聽審時所播放她在119電話中的淒厲求救聲音，打動每一位閱聽人，引發當時保守共和黨推動War on Domestic Violence，提出對暴力「零容忍」政策及刑事程序改革方針，要求政府對於家庭暴力罪應該予以嚴懲（Schneider, 2000）。

不同於家庭暴力防治與服務法，婦女受暴法的經費主要是配置於司法改革所需的經費，為了防治如上述的重大家庭暴力事件發生，婦女受暴法案在1994年後經過國會數次的授權修法，配置經費年年上升，對於警察體系、檢察體系和法院具有相當高的改革誘因（Gelles, 1997）。

三、小結

在美國建國初期，來自英國的清教徒社會其實是不認同毆妻的行為，認為有礙家庭和諧與穩定的營造，但隨著來自歐陸各地的新移民，有關毆妻行為的宗教性之社會控制逐漸解構，加上1680年代

英國對於殖民地的管制增強，期待新世界的司法運作應該與英國的普通法同一化，英國民法典中有關丈夫有毆妻特權說因而移植進入當時的美國社會，開啟了後續美國社會對於毆妻行為的不同司法回應之發展。從歷史的縱向發展的時序來看，依據毆妻事件合法與否和法院介入與否大致可以劃分成五個階段，移民初期的毆妻事件被視為破家庭佳和諧的「邪惡馬車」、英國普通法移入的毆妻特權說、經由轉化替代的家庭隱私、毆妻是可以治療之家庭不適應問題說、家庭暴力防治法律的形成。整體來說，除了移民新世界時期，美國有關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的法律制度發展在各個時期都是一種「法不入家門」狀態，直到1970年代引發美國倡議女權運動的女性主義者之關注，認為應該採取行動將這類家庭隱私事件轉化成為公眾事件（public matter），開始進行保護受暴婦女的改革行動，終於訂定聯邦的專法，配置固定的經費用於保護受暴婦女的各種服務措施（Schneider, 2000）。

參、美國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的司法改革與法律實踐成效

走到1970年代以後，美國的親密關係暴力的受暴婦女在尋求司法體系介入方面，大致會包括三個司法程序，一是申請保護令的民事程序，二是國家介入的警察

逮捕制度及刑事程序。在1970年以前，這些司法管道並不太容易被受暴婦女接近，但隨著保護受暴婦女運動的推動和倡議，民事與刑事的司法程序之實施狀況都曾經遭到批評，但在1970年代以後，這兩體系或制度都發生組織性及結構性的改變（Buzawa & Buzawa, 2008）。本章節將勾勒出這兩個體系的改革情形及其實踐的效益，並說明引發這些改革及變革趨勢的政治社會脈絡。說明如下。

一、民事程序的改革及其實踐效益

在1970年代以前，如果一個受暴的婦女想要選擇民事法院來介入她的受暴情境，必須經歷重重困難的關卡，在1970年代之後，在女性主義倡議者的努力下，受暴婦女可以已經可以獲得民事法律的救濟。首先，過去受暴婦女無法取得有效的法律回應，因為法院認定維繫家庭關係更勝於保護婦女免於受暴，在美國國會於1994年通過婦女暴力防治法後，最明顯的民事程序改革就是民事保護令制度（civil protection orders）的建制，讓受暴婦女在強制性高的刑事程序以外可以自我申請（self-initiated）民事保護令，來降低自己的受暴風險（Goldfarb, 2008）。另外，過去法院運用「配偶間侵權賠償免責」法則來否認已婚婦女的民事能力，以致百年來受暴婦女的「安全」與「自主」的法益受到限制。但婦女暴力防治法通過

後，家庭暴力事件民事侵權損害賠償已經變得可能了（Wriggins, 2001）。以下就禁制令過渡到民事保護令制度、民事保護令的成效評估、民事侵權損害賠償之請求制度三個改革階段，逐一說明如下。

（一）禁制令過渡至民事保護令制度

在1970年代以前，如果有一位受暴婦女決定要走民事途徑來制止伴侶對她的暴力對待，她唯一可以申請的是禁制令（injunction），分為暫時或緊急禁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基本禁制令（preliminary restraining order）或長期禁制令（permanent restraining order）；但不論申請哪一類的禁制令，她都必須先提起離婚告訴才能附帶申請禁制令。在1971年以前無破綻婚姻解消運動之前，這位婦女申請禁制令的第一關卡，就是必須準備好做出婚姻終止的決定，她還須找出一個說服法官同意離婚的破綻理由；第二個關卡，這位婦女必須找一位律師來協助準備離婚告訴所需的各種文件，如果沒有法律扶助的律師協助，她還必須準備一大筆錢以支應龐大的訴訟費用（Tarr, 2003）。第三個關卡是時間的延宕，當這位婦女找到一位可以協助訴訟的律師，需要準備的法庭文件相當多，例如，離婚申請書、傳票、禁制令申請書、擔保證明等，送交法庭；接著，因為待審案件積壓成堆，還要等待法官安排開庭的時間，又是一段等

待時間；同時，除非情況緊急，大多數法官不喜歡單方出庭的民事核定程序（ex parte proceedings），因此會請警察通知施暴者到庭，又是一段等待時間；有些法官在審理緊急禁制令，會希望受暴婦女親自出庭或傳訊有利的證人出庭，還希望這位申請婦女能夠提出請求事項具有立即不可回復的傷害、損失或毀損之證據。在進入申請基本禁制令的階段，因為暫時禁制令10天後就失效，法官會很快在10天內開庭審理，此時這位婦女必須提出強而有力的證據來說服法官核可基本禁制令的申請（Tarr, 2003）。

當這位婦女終於取得禁制令，尚有其他離婚的程序必須完成，例如，兒童監護、贍養費、債務分償等議題的審理和判決，整個民事程序的時間可以拖得非常的久，這位婦女仍需要跟他的施虐者繼續見面或協商。最後一個關卡，如果施虐者違反禁制令的規定，這位婦女必須再度回到法院，開啟起訴這項違規的法律程序，她又得開始找律師、等法官，同樣的程序再度經歷一次，以致於在1970年以前婦女對於使用民事程序來解決其家庭暴力事件相當卻步（Tarr, 2003）。

直到1976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訂定 *Protection From Abuse Act* 之後，申請民事保護令變得比較順暢（Buzawa & Buzawa, 2008）。受暴婦女向法院提出的民事保護令之申請，已經不需要同時提出離婚訴

訟，申請的程序也不一定需要律師的陪同，甚至申請的程序已經簡化到只要「填寫表格」即可申請，如果申請的是緊急或暫時性民事保護令，法院每天有固定的收件時間，法官只需要審閱申請文件、根據婦女的陳述，就可以核准暫時保護令，並立即寄交這位婦女，執行保護令的警察單位也會同時會收到該份文件的影本，進行後續的監控執行（Tarr, 2003）。

目前，美國的民事保護令的類型分成下列三階段（Kahn, 2008）：

（1）緊急性保護令（emergency ex-parte orders）：因應緊急需要，法院在不開庭的情況下核發。

（2）暫時性保護令（emergency ex-parte orders）：法院在不開庭及不通知所謂的加害人的情況下核發。

（3）通常性保護令（final protection orders）：法院要開庭審理，且通知必須送達所謂的加害人，才核發。

在核發的程序上，法院核發保護令考量的要件有二，一是「關係」要件，二是「行為」要件。說明如下（Kahn, 2008）：

（1）申請保護令的兩造必須符合下列關係類型，家庭成員（family members）、家戶成員（household members）、約會關係、親密伴侶。有些州法院重視的家庭關係必須有婚姻關係或血緣，有些州則比較廣泛。根據統計，美

國有3個州不認定前配偶為親密關係，有8個州不認定家戶成員（非家庭成員），有6個州不認定任何形式的約會或性關係等，相當不一致。

（2）申請保護令的理由須符合下列三類行為要件，一是必須符合特定的刑事犯罪行為，二是列舉傷害行為，例如，身體傷害、有立即危險的身體傷害之恐懼，三是綜合上述兩類的行為。在美國，目前有11個州法院要求申請者必須舉證加害人已經觸犯特定犯罪行為才能核發，有19個州則只要列舉傷害行為即可，21個州則採用綜合取向的行為認定。

一旦取得保護令，申請人可以獲得的保護範圍或救濟類型如下：

（1）禁制令救濟：禁止加害人威脅、施暴、接觸、騷擾、靠近受害人，禁止加害人進入住所、禁止加害人擁有武器或傷害動物等，美國各州皆有此規定。

（2）金錢救濟：要求加害人償付毀壞家具的損失、支付醫療費及其他法院的支出，最常見的補償救濟是支付律師費用。

（3）家用及支持費用救濟：支付暫時子女贍養費、日常家用、寵物照顧費等，只有12州法院未納入暫時性贍養費、七州不納入生活費核發項目。

（4）其他救濟及期間：核發項目尚包括親職教育課程、心理治療、戒治治療、GPS追蹤器，核發項目的執行期間從180天到未定日期（Kahn, 2008）。

（二）民事保護令的成效

在2018年，美國50州的民事法院皆會有暫時性保護令和通常保護令的核發，但僅有23州核發緊急保護令，Goldforb（2008）彙整了一些有關民事保護令成效的研究結果，顯示民事保護令是美國受暴婦女使用最為頻繁的民事程序，被認為是相當有效的民事救濟措施。

（1）使用者的滿意度：根據三個調查研究顯示，分別為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科羅拉多州、威斯康辛州的調查使用過民事保護令的婦女對於其生活的影響或安全感影響的滿意度高達85%左右，滿意程度較高的通常是那些想要結束關係的婦女。

（2）施暴者的遵行度：德州調查顯示，受訪的受暴婦女表示申請民事保護令後，比起沒有申請的婦女，暴力事件的發生明顯下降，而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調查顯示，申請保護令三個月後，表示施虐者沒有問題的婦女比例高達72%，六個月後沒問題的情況為64%；而西雅圖的調查顯示，比起沒有申請保護令的婦女，申請者在九個月中有72%不再發生肢體暴力。在再犯率方面，一個四州調查資料顯示，申請保護令四個月後，有24%的施暴者再犯，麻塞諸塞州的調查顯示兩年後的再犯率是54%，最高再犯率的是科羅拉州的調查，滿一年後的再犯率是60%。

（3）再犯率的因素：在各種調查研究顯示，施暴者的前科似乎最具有預測力，這和之前的明尼蘇達州的遏阻研究結果相似，愈沒有任何顧忌的施暴者愈有可能再犯。另一個預測的因素則是之前的施暴類型和嚴重程度，或當時就很抗拒民事保護令的施暴者，愈容易再犯。

（三）民事侵權損害賠償之請求權

Wriggins（2001）探討家庭暴力事件民事侵權損害賠償，發現美國的律師開始注意到家庭暴力事件可以民事賠償告訴的可能性，應該是從美國國會在1994年所通過的婦女暴力防治法，且這類的案件提訴頻率愈來愈高，獲得法院的勝訴判決也愈來愈高比例。根據Carey（2014）的彙整，美國的損害賠償制度主要著眼於財務方面的補償，受暴婦女若能經由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獲得勝訴，對於受暴婦女而言是具體而有助益的經濟效益。根據她的分類，美國在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個類型：

（1）補償性損害賠償（compensatory damages）：這類的補償適用在疏失、過失、故意的侵權告訴中，賠償的內容包括醫療支出、受傷相關的支出、失去工作能力、痛苦和煎熬等，金額的計算大致以傷害相關的上述傷害可能造成的現在和未來的損失，最後是一筆總數的金額來給付。在家庭暴力的是件中，最嚴重的傷害事件

中會有88%獲得賠償、中等傷害的會獲得67%，最近受傷的會有32%獲得補償，顯示受暴婦女因受傷而獲得勝訴判決的比例相當高。另外，因為家庭暴力事件所引發的情感煎熬或傷害，也可以歸在這個類型的損害賠償，基於美國人多會接受心理諮商的機會，這類的補償可有心理諮商的費用來舉證所需的支出。

（2）象徵性損害賠償（nominal damages）：這類的賠償適用於故意性侵權行為，損害主要來自侵權本身，例如，毆打成傷、性侵害、攻擊性行為、故意情感虐待、禁止外出等，原告可以在起訴中合併提出這項賠償。例如，一個被禁止外出的受暴婦女，沒有身體傷害，也沒有情緒上的傷害，但曾經失去自由，仍可請求加害人賠償，賠償金而通常也是以一個總數金額。

（3）懲罰性損害賠償（punitive damages）：這類的補償僅適用於故意侵權行為，法院審查時會針對不當行為的心理情境做一個評價，必須是惡意的故意而為的侵權行為。在家庭暴力關係的權利控制動力中，婦女經常被要求以家庭為主以致無法額外追求工作上的晉升和加薪，這類的惡意並不容易從告訴的結過來推測，以致於補償性損害賠償計算依據婦女的薪資來計算賠償金額總是會縮水，懲罰性賠償金額的攻防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在大多數的家庭暴力事件中，很多施暴者所為的

暴力行為經常是出於惡意或故意，適合提出這類的損害賠償。但因為這項賠償的特殊性，法院都會特別審查，並不容易判決勝訴。

二、國家介入的刑事程序之改革及其實踐效益

1984年以後，美國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律改革另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刑事化的發展，警察制度與檢察體系都在這段時間做了很大的改變，促成這樣的改變不只是單一事件的促成，也有其時代的背景。例如，1960年適逢美國War on Crimes運動，當時檢警體系對於強暴事件、性別犯罪、犯罪受害人等的處理不力，在在都顯示刑事機關或法律制度失靈，有關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律改革因而應運而生（Gruber, 2007）。本章節主要說明美國的刑事程序之改革，主要是聚焦於1970年後的警察逮捕制度和檢察體系的刑事程序之改革及其成效。

（一）警察的逮捕制度之變革

在三個司法體系中，基於與民眾互動的緊密度，警察是一般受暴婦女會最先尋求協助的體系，但也因為警察長期以來對於家庭暴力事件所採取「迴避逮捕」（arrest avoidance）的措施，長期以來最為受暴婦女所抱怨。最後，警察逮捕體系在1970年代女權運動的初期，

在各方的期待下朝向「無令狀逮捕」（warrantless arrest policy）和「強制性逮捕」（mandatory arrest policy）兩個制度的發展，之後警察的逮捕制度就整個脫胎換骨，趨向強制性。

1. 「迴避性逮捕」的批評

在1970年代以前，警察並不認定介入家庭暴力事件是其執法責任，不是來執行解決家庭糾紛是社工角色，警察的招募或訓練強調「執法者」、「打擊犯罪者」的硬漢角色，以致於當時的警察文化不特別重視介入家庭糾紛的公共價值（Buzawa & Buzawa, 2008）。例如，在1960年代，警察稱毆妻事件為「家庭內的滋擾事件」（domestic disturbance），並非一般刑事的傷害罪事件，其中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對於「家庭滋擾事件」的處理準則：「一旦在家裡，警察唯一的目的就是維持和平」；1975年的Oakland Police Department之警察處理家庭糾紛的訓練手冊（*Training Bulletin on Techniques of Dispute Intervention*）說明，主張：

在爭論情況下，警察的角色是中介者和和平維持者，不是法律執行者，……逮捕只會惡化爭論或製造警察陷入危險的機會。（Epstein, 2002）

總之，過去警察對於親密關係暴力事件採取的經常是「迴避性逮捕」態度。

在1970年代，雖然警察有逮捕現行犯的公權力，警察的訓練也強調打擊犯罪的角色，但在一些針對警察回應家庭暴力事件的研究調查中，證實警察通常顯得消極或延遲的回應；例如，一項調查顯示，警察接到家庭暴力事件的通報時，大致會採取四種處理方式，危機處理的治療取向、犯法行為的處罰取向、安撫受害人的補償取向、疏通雙方爭執的調解取向，而其中警察使用最多的方式是調解取向，高達70%，主要就是責備施虐者，安撫受害者，盡力疏通衝突情況，不傾向逕行逮捕（Buzawa & Buzawa, 2008）。基於警察經常是家庭暴力事件通報的第一個回應者，女權運動的倡議者最立即的期待，就是警察能夠在回應通報時能夠表現的更積極、更支持性逮捕（pro-arrest），以便及時提供婦女安全的保護。

2. 「無令狀逮捕制度」的建立

又稱之為推定逮捕（presumptive arrest），屬於支持性逮捕制度的一種。其實，一般家庭暴力事件通常發生在家中，有時不是嚴重的傷害罪，但如果有可能發生嚴重的傷害，讓警察依據州議會所通過的法律，依據現場的裁量權來決定逕行逮捕與否；依據各州的法律規定，無令逮捕的原則有二，一是警察有可資相信之理由（probable cause）認為傷害罪正在發生，二是傷害罪的發生是現場的，必須予以逮捕才能排害（Epstein, 2002）。根據

上述的資料，在1983年，美國大概有28個州修改了他們的警察逮捕規定，允許警察依據現場的裁量權逕行無令逮捕的可能性，到2001年全美50州都已立法通過無令逮捕制度（Gruber, 2007）。

3. 「強制性逮捕制度」的建立

受到多起社會事件及政府政策改變的影響，警察體系進一步朝向另外一個支持性逮捕制度發展，就是「強制性逮捕制度」；此制度更進一步排除警察到現場的裁量權，直接依據法律逮捕發生家庭暴力衝突的一造或兩造。最早，在1960-1970年代之間，許多學者積極投入有關警察體系回應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的學術研究，直接指出警察體系在回應親密關係暴力事件有許多的問題，也提出警察逮捕制度的改革方向參考模式（Buzawa & Buzawa, 2008, p. 73）（註7）。但最具有影響力的研究則是，1981年社會學家Lawrence Sherman和Richard Berk在明尼蘇達州所Minneapolis市所進行的實驗計畫，他們於1984年出版*The Specific Deterrent Effects of Arrest for Domestic Assault*，提出遏阻理論（deterrence theory），研究指向警察的強制性逮捕有助於降低家庭暴力加害人的再犯率，雖然他們還有後續的修正研究研究果，但這項研究結果對於警察朝向支持性逮捕制度之改革具有深遠的影響（Buzawa & Buzawa, 2008）。

另外，在1976和1977年，先由兩位

女律師代表受暴婦女分別向紐約市和加州的Oakland市警察局提出集體訴訟，起訴兩個市政府的警察沒有善盡逮捕施暴者的公權力，以致她們的當事人受到嚴重傷害（Schneide, 2000）。結果，紐約市警察承諾只要確信有傷害事件或違反保護令事件，他們一定會予以逮捕，並留在現場確保婦女安全（Goodmark, 2017）。然而，除非犯罪行為當場發生、嚴重傷害可能發生，警察仍然必須有令狀才能逮捕現行犯，對於家庭暴力罪經常以輕罪（misdemeanor）行使「有令狀逮捕」。除了上述的兩件集體訴訟案外，同時仍有多個州的女權律師也相繼向各州法院狀告警察局對於親密關係暴力的不當處理，已經引發各州的警察體系開始重新思考目前所採取的逮捕策略。

但造成警察逮捕制度的重大事件則是發生在1983年的一件家庭暴力事件，重創警察威信，帶來警察局必須支付受害人高額的侵權賠償金，因而徹底改變警察的逮捕制度。當時，一位22歲的Thurman太太，帶著一個兩歲半的兒子，居住在康乃狄克州的Torrington市，因為他的先生經常毆打她，威脅要殺她，她已經申請保護令，並與丈夫分居；但Thurman先生經常來騷擾這位分居的太太即便Thurman太太報警多次，仍無法阻止先生的騷擾，也未獲得警察的保護；在6月10日，Thurman先生又來家裡騷擾，要求談話，Thurman

太太就打電話報案，等15分鐘後，警察沒來，Thurman太太只好出去跟她先生說話，沒想到她先生用預備的刀刺傷他的胸部、頸部和喉嚨，13刀之多；25分鐘後，一位警察到場（Frederick Petrovits），看到Thurman先生手拿著血刀、腳踢他太太的頭，並衝進家中抓起他們的兒子丟到躺在血泊中的母親，然後繼續腳踢Thurman太太，該警員當時仍未採取任何行動，直到另三位警察到場，Thurman太太抬上擔架上，Thurman先生才正式被逮捕；沒有逮捕似乎是因為警察認識Thurman先生，但也跟警察採取迴避逮捕的策略有關；因為這個傷害事件，Thurman太太向Torrington市警局提出賠償告訴，請求法院判決警局給予民事賠償2,300萬元，法院准許，最後雙方以1,900萬元和解（Hanna, 1996）。

在1984年以後，美國檢察總署的主任檢察官已經向各州政府警察體系提出建議，對於親密關係暴力事件，警察應將加害人視為現行犯，當場予以逮捕，施行「無令逮捕」；但當時的女權倡議者G. Kristian Miccio教授更觀察到警察逮捕家庭暴力犯的現場裁量權過大，往往無法合適的保護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向紐約市提議「強制性逮捕」的立法，因為她相信強制性逮捕可以帶動檢察官的起訴，確保兩者的比例數據相當，有助於減少施虐者的未來暴力再犯（Bailey, 2010）。

在1977年，奧瑞岡州首先通過強制性逮捕的立法，在1982年計有五個州通過相似的立法，到了1994年就增加到21個州通過立法；在國會通過婦女受暴法後，州政府必須通過某種支持性逮捕政策才能取得聯邦的經費補助，例如，無令逮捕或強制性逮捕制度（Epstein, 2002）。目前，幾乎全美50州政府都已經訂定「強制性逮捕」的法規，對於家庭暴力事件發生現場的現行犯逕行逮捕，對於違反民事保護令的禁制規定事件的現行犯也予以逮捕，整個警察體系在回應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變得非常積極及強制性（Hanna, 1996）。

（二）檢察體系的改革及其成效

從1970年代開始，美國的犯罪調查（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的資料顯示，大約有三分之一受到傷害的女性之受害原因是源自家庭暴力事件，隨著警察逮捕制度的改革趨於積極及強制後，保護受暴婦女運動的倡議者改為聚焦於檢察體系的刑事程序改革，希望能藉由提高起訴率達到遏止家庭暴力事件的再發生；刑事程序的改革方向主要是希望建立一個支持受害人追訴的檢察制度（pro-prosecution），大致有兩個制度的改變，一個是強制遠離命令（mandatory criminal stay-away）（即刑事保護令），二是禁止撤回告訴制度（no drop policy）（Epstein, 2002）。

1. 刑事保護令制度

不同於民事保護令，刑事保護令是由法官所發給的，不是受暴婦女自己申請的，發給原因通常是家庭暴力罪已經起訴或違反民事保護令被逮捕，發給的時機通常在繳納罰鍰或審前釋放，有效期間起自法官的發給、終於案件審查終結，保護令規範的內容大多是命令遠離受害人，有時候會要求加害人接受心理治療、限制子女探視權、禁止使用原來居所或其他產權（Kethineni & Beichner, 2009）。

2. 禁止撤回告訴制度

倡議禁止撤回告訴制度的學者Hanna（1996）表示，檢察官經常無法暴力加害人的原因，來自受害人經常是不合作、無意願、撤案，以致無法完成刑事起訴的程序，她因此主張檢察體系推動友善受害人的刑事程序制度（pro-prosecution），建議檢察官一旦起訴家庭暴力罪，不論受害人自願與否都要求其必須參與起訴程序，稱之為強制起訴制度。

目前美國檢察體系所採用的禁止撤回起訴制度有兩類，一是絕對禁止撤回告訴制度（hard no-drop），一是有條件允許禁止撤回告訴制度（soft no-drop），前者以明尼蘇達州的Duluth市之檢察署的Duluth模式為代表，亦即不管受害人的意願為何，檢察官依據證據起訴，不論是偵察階段或起訴階段，受害人有義務配合調查，如有需要受害人出庭作證，檢察官

可以逕行傳喚證人，不得拒絕；後者則以加州的San Diego市檢察署所推動的San Diego取向，亦即檢察官針對家庭暴力事件一律起訴，不管受害人的起訴意願，檢察官的策略重點在取得受害人的受暴證詞，只要傷害案件是可以證明的，不需要強制受害人出庭作證；目前，大多數的州政府採用軟性禁止撤回起訴制度，若受害人因為各種考量不願意提出告訴，經由法官或諮商師釋明撤銷告訴的後果後，法院並不會強制受害人出庭應訊，採用此種模式的是維吉尼亞州的Alexandria市的檢察署（Hanna, 1996）。

Hanna（1996）就以1933年發生的Nicole Brown被殺的事件為例來說明強制起訴制度的實施，或許可以改變該事件後來發生的結果。根據119電話錄音，Simpson先生在1993年的10月就已經闖入她的前妻Nicole Brown女士的居所，當時Nicole Brown女士用顫抖的聲音拜託接線員幫忙叫警察來，她擔心她會被她的前夫揍死的，而錄音的背景聲音是Simpson先生的咆哮和撞門聲；由於加州當時並沒有訂定警察強制性逮捕規定，雖然警察有到場，但Nicole Brown女士不願意警察的逮捕建議，也不想提起訴訟，以致於後來發生進一步的謀殺憾事；如果受害人當時住在明尼蘇達州的Duluth市，在10月份Simpson先生硬闖Nicole Brown女士的居所時，警察就會啟動現行犯的強

制性逮捕程序，這對於Simpson先生的攻擊性或多或少會有遏止效果；接著，不管Nicole Brown同意與否，檢察官可以對Simpson先生啟動刑事告訴程序，簽署刑事保護令，命令Simpson先生遠離Nicole Brown女士；在10月份的調查中，警察一定會依據該行政區的通報案件程序進行蒐證，例如，對Simpson先生所踢破的門照相，接著紀錄Nicole Brown女士及其朋友的身體受傷情況，然後詢問有聽到該事件發生的鄰居以便檢察官後續的傳喚和蒐證；依據當時前往現場的警察之證詞和119的錄音、鄰居訪談等資料，檢察官就可以對Simpson先生提出攻擊、傷害罪、破壞財產罪、侵入門戶等提起刑事告訴了（Hanna, 1996）。

（三）逮捕制度及刑事程序改革後的防治成效

在成效方面，根據實證研究顯示，採行絕對禁止撤回告訴制度取向的San Diego模式，積極的起訴政策確實可以降低家庭暴力罪的謀殺案件比率，例如，該市因家庭暴力而致死的謀殺案件從1985年的30%降至1994年的7%；同時，如果州政府願意投資更多資源給檢察體系，該市的家庭暴力罪之起訴率、再犯率、零容忍的訊息傳遞都有明顯的改善，例如，Duluth, Quincy, Massachusetts, San Diego, Seattle, Indianapolis等城市，也都呈現上述各項比例數字的改善（Hanna, 1996）。

再者，依據美國National Cr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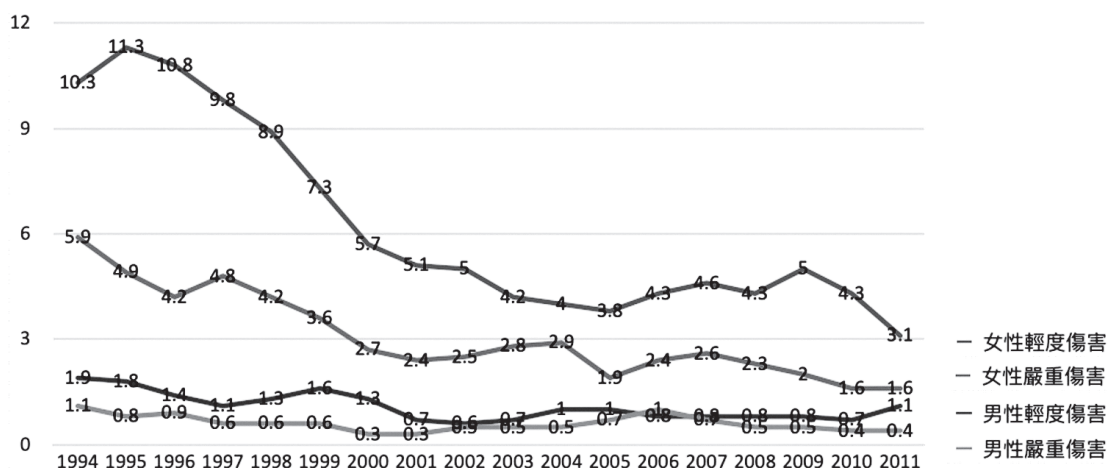


圖 1 美國 1994 ~ 2011 年間的親密關係犯罪趨勢圖

資料來源：Catalano (2013)。

Victimization Survey，從1994年所採取的各種積極性司法回應改革，反映在其犯罪調查資料上。美國的嚴重家庭暴力事件（強暴或性侵害、搶劫罪、加重傷害罪、傷害罪）之女性受害人，從1994年的每千人5.9位降到2011年每千人的1.6人，下降了72%，輕傷的家庭暴力事件女性受害人，從1994年的每千人10.3位降到每千人3.1位，下降了70%；同樣地，男性受害人的受害比例也下降，例如，男性的嚴重傷害事件下降了64%，詳見圖1的親密關係犯罪趨勢圖。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為法務部所進行的問卷調查，調查方式為自陳問卷，調查內容是詢問受訪者過去六個月是否曾經遭受非致命性犯罪（強暴或性侵害、搶劫罪、加重傷害罪、傷害罪）或財產損失犯罪（強盜罪、竊盜罪、縱火罪、竊車罪及其他），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族群、婚姻、教育程度和收入水準等，如果有遭受犯罪傷害，也會詢問加害人的基本資料，年齡、族群、性別、與受害人關係，犯罪發生的特性（地點、時間、使用武器與否、傷害性質、經濟後果），犯罪是否報警、不報警理由；這項調查的對象為美國12歲以上的公民，代表性樣本，抽樣是以住戶為單位，選定同戶中的一個人為受訪對象，住戶也包括團體住戶，例如，宿舍、軍隊、安置機構、宗教宿舍、

遊民等，受訪者每三年輪替一批，每一位受訪者每六個月接受訪談一次，共訪談七次。以2011年為例，12歲以上的受訪者有143,120人，隸屬於79,800住戶，受訪者的回覆率80%，住戶回覆率90%。

肆、結語

在檢討臺灣《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法律移植經驗之前，本論文特別針對美國防治家庭暴力事件的專法形成歷程進行溯源的追蹤和分析，這是其他研究或文獻很少會探討到的美國《家庭暴力防治法》專法形成的歷史脈絡。本論文的探討希望對於臺灣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實施者有所參考，對於未來臺灣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推動有所省思。

由上述的文獻分析中可知，美國的司法制度對於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的因應最早可以追溯至1630年代清教徒剛剛移民到新世界的時期，當時教會法庭視殘酷和暴力對待自己妻子是一種「邪惡的馬車」，可能危害到社會秩序的維繫，對於加害人會給予懲戒或懲罰。但是，到了1680年代，英國的殖民管制增強，對於殖民的新世界採取英國普通法同一化的政策，也產生了一段強制法律移植的歷程。其中，英國民法典中有關丈夫有毆妻特權說，得以進入美國當時的社會生活之中，法院判決依據特權說原則不介入親密關係的毆妻事件之

中，隨後，法院改以丈夫毆妻是家庭隱私的是件，「轉化」舊有的毆妻特權說，再度宣告政府的「法不入家門」原則。

一直到1960、1970年代，美國適逢風起雲湧於的第二波女權運動，透過庇護所運動，蒐集受暴婦女的親身經驗，開始推動婦女性別意識覺醒的運動，框架家庭私事為「社會問題」，更直接倡議司法改革來回應受暴婦女在家庭內的不正義事件，進行一場由下而上的司法改革運動。最後，許多婦女團體團結起來，成立聯盟組織，進行修法倡議，在媒體報導推波助瀾之下，學術界投入有關家庭暴力事件再犯的遏止理論研究，社會開始關注親密關係暴力的議題。加上1983年的Thurman事件重及1994年的Nicole Brown Simpson事件，美國Department of Justice終於將親密關係暴力定調為「犯罪行為」，建議政府採取刑事化制度來回應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美國國會也在1994年通過《婦女暴力防治法》，編列經費補助各州政府，來推動改革刑事處置程序來因應親密關係暴力問題。因此，各州政府開始發展建立刑事化的措施，例如，警察體系發展無令逮捕及強制性逮捕制度，賦予警察依據職權評斷或沒有裁量空間的情況下逕行逮捕家庭暴力罪的現行犯，檢察體系則發展強制性起訴制度，即便受暴婦女不願繼續起訴，檢察官還是應該依據證據而起訴加害人。根據美國的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資料顯示，美國自1994年的積極司法改革後，犯罪調查資料顯示明顯的成效，例如，嚴重家庭暴力事件和輕傷的家庭暴力事件的女性受害人從1994年都明顯的下降，而男性受害人的受害比例也同樣地下降了。

根據Bailey（2010）的說法，美國婦女暴力防治專法的倡議主要是由女性主義思想的法律專業人員所推動的，倡議的重點聚焦於「刑事化」的政策改革取向，原因如下：

（一）由於親密關係的暴力事件經常遠低於其他犯罪事件，女性主義者相信強制性逮捕和起訴有助於達成正式的性別平等。

（二）為了增進婦女的權能來免於虐待，女性主義者相信這些政策有助於遏止親密關係暴力的再犯。

（三）支持強制政策的人認為這些政策具有象徵性的意義，目的在向社會表示政府對於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的發生會嚴肅以待的。

整體來說，美國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律的建制基本上是一個「刑事化」司法制度上的革命性改革，雖然有些法律學者已經開始提出「過度刑事化」的批評，但仍有許多法律學者繼續支持這項發展趨勢，近期內的改變可能性不高，但在命加害人的處遇計畫之介入措施提出改革的可能性則比較高，例如，有學者提出加害

人處遇計畫、修復式正義措施、降低強制性特色等建議，希望在刑事化的強制介入之法律規定之外提供解決問題的處遇方案（Goodman, 2017）。由於美國的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資料反映出，美國自1994年的積極司法改革後，犯罪調查資料顯示明顯的成效（Catalano, 2013），例如，嚴重家庭暴力事件和輕傷

的家庭暴力事件的女性受害人從1994年都明顯的下降，而男性受害人的受害比例也同樣地下降了。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名譽教授）

關鍵詞：《家庭暴力防治法》、法律移植

註 釋

註1 這是英文諺語 “the rule of thumb”（英譯為「原則上」）的來源。

註2 根據Pleck（1987）的說法，在美國的歷史中，最早呼籲社會關注毆妻的家庭暴力事件的是禁酒運動團體（Temperance Movement），該團體大約成立於1808年，基於禁慾的意識型態而反對喝酒，他們自行募款倡議政府頒佈禁止賣酒法令。在1840年代，這個禁酒運動團體吸引不少女性倡議者參加，他們首度將毆妻事件與酒精掛勾，認為喝酒的男人是造成毆妻事件發生的主要之惡，他們發現當時美國社會的酒精消費量太大，以致許多男人喝酒，在酒精的作祟下造成毆妻事件頻傳，他們稱這些受害婦女為「醉鬼的妻子」（the Drunkard's Wife）。在1850年代，禁酒運動倡議者呼籲政府應該禁止酒的買賣、建立無酒區域、週日關閉酒店等，基於護衛正常家庭道德的價值，倡議酗酒丈夫應該禁慾，而酒鬼妻子也會善盡家庭責任以降低毆妻事件的發生，維持家庭的完整性，法律仍不應該介入家庭的隱私事件。

註3 兩位紐約州的禁酒運動倡議者，Susan B. Anthony和Elizabeth Candy Stanton，在1850年代號召演講及示威，主張醉鬼的妻子是無望脫離苦難，醉鬼的父親會製造下一代醉鬼，請求紐約州議會通過分居或離婚法律，允許丈夫酗酒作為請求離婚的理由，他們甚至主張婦女有權利拒絕醉鬼丈夫的性交要求。兩位倡議者對於「醉鬼丈夫」的離婚法律改革引起社會不少的討論，特別是他們所形塑的醉鬼妻子的困境，以致在1860年代有些極端殘酷的家庭暴力案件訴請離婚得以獲得法院的認可而得以離婚；但她們激進的主張卻也引起護衛家庭價值的衛道人士或宗教人士的反感，紐約州或聯邦政府幾次提出的離婚法律改革最終都未能通過。

- 註4 Abbott v. Abott的案件發生在1877年，妻子對丈夫提起侵權損害（tort），因為她的丈夫猛烈的毆打她，用熱鐵燙她，甚至將她關進精神病院一段時間，造成她的健康受損及精神不適。法院以妻子不可以向丈夫請求損害賠償而駁回其請求，並說：「這種事最好是在垂簾之後處理，避免在公眾之前處理，以便雙方有機會遺忘或原諒」以及說：「婚姻的存續期間發生這種隱私事件，訴諸訴訟，會造成丈夫財產的損失」。
- 註5 在1966年，美國成立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簡稱NOW），全國婦女組織接著在1975年10月第八次年會成立National Task Force on Battered Women/Household Violence，推動意識覺醒及庇護所運動。最後，在1978年，美國民權運動組織（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集合100多個婦女團體，組成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NCADV），針對婦女受暴的議題進行組織性的倡議及修法建議，成為美國家庭暴力防治之司法改革的重要推手。
- 註6 如1973年在Phoenix, Arizona成立的Rainbow Retreat，應該是最早的受暴婦女庇護所，1974年在Pasadena, California成立的Heaven House，這兩所庇護所是早期收容躲避酗酒丈夫的婦女。
- 註7 如Parnas在1967年發表的‘The Police Response to the Domestic Disturbance’及‘Police Discretion and Diversion of Incidents of Intra-Family Violence’，深入探討警察體系在回應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的問題；Morton Bard在1973年出版的*Family Crisis Intervention: From Concepts to Implementation*。

參考文獻

高鳳仙（1998）。《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專論》。五南。

吳素霞、張錦麗（2011）。〈十年磨一劍——我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回顧與展望〉。《社區發展季刊》，143，328-345。

Bailey, K. D. (2010). Lost in transition: Domestic violence,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100(4), Article 1.

Buzawa, E. S., & Buzawa, C. G. (1990). *Domestic violence: The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 Sage.

Carey, C. (2014). Domestic violence torts: Righting a civil wrong. *Kansas Law Review*, 62, 695.

Catalano, S. (2013).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ttributes of victimization, 1993-2011*.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bjs.gov/content/pub/pdf/ipvav9311.pdf>

Deptn of Justice, 202, Stop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Project Advocates for Human Rights. <http://>

hrlibrary.umn.edu/svaw/domestic/laws/modellegislation.htm

- Epstein, D. (2002). Procedural justice: Tempering the state's response to domestic violence.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43(5), 1843-1905.
- Gelles, R. J. (1997). *Intimate violence in families* (3rd ed.). Sage.
- Goldfarb, S. F. (2008). Reconceiving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for domestic violence: Can law help end the abuse without ending the relationship. *Cardozo Law Review*, 29(4), 1487-1551.
- Goodmark, L. (2017). Should domestic violence be decriminalized?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Gender*, 40(1), 54-113.
- Gordon, L. (2002). *Heroes of their own lives: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of family violen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Gruber, A. (2007). *The feminist war on crimes (Paper No. 07-04)*. FLU Legal Studies Research.
- Hanna, C. (1996). No right to choose: Mandated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violence prosecutions. *Harvard Law Review*, 109(8), 1849.
- Kethineni, S., & Beichner, D. (2009). A Comparison of Civil and Criminal Orders of Protection as Remedies for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in a Midwestern County.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4(5), 311-321. <https://doi.org/10.1007/s10896-009-9231-x>
- National Council of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 (2012, March 15). *Model code on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Retrieved June 13, 2020, from <https://www.ncjfcj.org/publications/model-code-on-domestic-and-family-violence/>
- National Sexual Violence Resource Center. (n.d.). National Center for Domestic and Sex Violence. Retrieved June 8, 2020, from http://www.ncdsv.org/images/NYCHRADSS_TimelineBWM_2008.pdf
- Pleck, E. (1987). *Domestic tyranny: The making of social policy against family violence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University.
- Schneider, E. M. (2000). *Battered women and feminist lawmaking*. Yale University.
- Siegel, R. B. (1996). The rule of love: Wife beating as prerogative and privacy. *Yale Law Journal*, 105(8), 2117-2207. <https://doi.org/10.2307/797286>
- Tarr, N. W. (2003). Civil orders for protection: Freedom or Entrapment?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 Policy*, 11, 157-194.
- Teubner, G. (1998). Legal irritants: Good faith in British law or how unifying law ends up in new divergence. *The Modern Law Review*, 61(1), 11-32. <https://doi.org/10.1111/1468-2230.00125>
- Tieney, K. J. (1982). The battered women move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wife beating problem. *Social Problems*, 29(3), 207-220. <https://doi.org/10.2307/800155>

The Advocates for Human Rights. (2020). *Domestic violence: Law and Policy*. <http://hrlibrary.umn.edu/svaw/domestic/laws/modellegislation.htm>

Wriggins, J. (2001). Domestic violence tort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75, 122-184.